

天一讲堂

2007

主编 庄立臻 库金红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天一讲堂

2007

主编 庄立臻 库金红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 (C I P) 数据

天一讲堂. 2007/庄立臻, 库金红主编.—北京: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5034-2182-2

I. 天… II. ①庄…②库…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8991 号

责任编辑: 梁志安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印 装: 宁波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75 **字数:** 34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序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精髓和灵魂，也是提升城市品位的主要因素，更是激发城市活力的不竭源泉。文化已成为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全局性、基础性要素。构建和谐社会，既包含着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容，同时更需要和谐文化的引导和支撑。

当前，宁波市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科学发展观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确立新的文化发展观，既要抓好代表城市形象的硬件设施建设，更要弘扬理性的精神，保持清醒的头脑，寻求理论的支撑，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尽到文化应有的责任。

“天一讲堂”正是顺应了这一要求，以“搭交流平台，激智慧火花，播人文精神，扬宁波文化”为宗旨，为广大市民传播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新思想、新观念，启迪民智，传播思想，繁荣文化。作为一项面向社会公众、纯公益性的文化活动，从2006年4月一面世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至2007年底，“天一讲堂·名家论坛”已陆续邀请了海内外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及其他各个领域的39位专家、学者成功开讲。可谓堂堂精彩，场场爆满。“天一讲堂”不仅让人领略到了大师的思想风采，更为重要的是引导着越来越多的人汇入到思考、探索和交流的洪流中去，为营造崇尚知识与人文精神的良好氛围做出了努力。

“天一讲堂”的开设，也使图书馆的学习功能得以拓展，服务内容更加丰富，其作为市民学习场所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周末到图书馆听讲座已经成为市民一项新兴的文化选择。

希望“天一讲堂”保持与时俱进的思想活力，博纳兼容，激荡思想，启迪思维，努力把它办成宁波的城市文化品牌。

是为序。

柴 英

2008年3月

目 录

- 001 杨东平 教育公平与和谐社会构建
- 023 易宪容 中国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与未来发展
- 040 葛剑雄 移民与中国：从历史看未来
- 060 何增科 地方政府创新与善政
- 078 党国英 社会转型时期的冲突与平衡
- 099 茅于軾 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问题
- 118 沈国放 当前国际热点与大国关系
- 140 雷 颐 语言的力量——近代以来中国“新词语”的演变
- 163 张颐武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
- 192 杨 毅 战略机遇期内的国家安全
- 219 骆玉明 闲话西游
- 234 周国平 哲学与人生
- 254 王自磐 南北极——大国博弈
- 270 陈 健 联合国和中国的联合国外交
- 289 张结海 中国男人的世界形象
- 306 肖复兴 生活与文学的奥秘

教育公平与和谐社会构建

演讲嘉宾:杨东平

时 间:2007年1月6日

地 点:宁波市图书馆报告厅

嘉宾简介:杨东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城市季风》而广为人知。他虽然是一个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专家,但在专业之外,他有广泛的社会关怀。从环境到教育,从人文到社会发展,他的声音始终不断。他较早注意到国家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呼吁关注农村教育、城市贫民教育和打工者子女的教育。他还直接参与了关于环境保护和民间教育发展的许多具体活动,从研究到组织,都显示了他对社会进步的热情和才能。他现为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副会长、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总策划,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百家讲坛》总策划。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理论、教育现代化理论、现代教育史、教育公平理论等。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关于教育公平的问题。大家知道,进入新世纪以后,从国家层面到社会层面来说,教育公平成为被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大家知道一个新的说法,教育、医疗和住房成为老百姓头上新的三座大山。还有个说法,房改把老百姓的钱包掏空,教改把人逼疯,医改提前送终。看来教改还不是最坏的,比医改好一点。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这个世纪之交,反思教育改革之时,一方面,在上世纪整个九十年代,中国的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发展。这里主要有两个数字,一个是95%,就是95%的人口覆盖地区普及了义务教育。我们在2000年宣布要基本普及的时候是85%的地区,现在是95%,到2010年,普及工作全部结



束,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第二个数据,是21%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05年达到了21%。在2000年制定“十五规划”的时候,当时制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到2010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15%,这是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下线,结果2002年就达到了。因为1999年以后开始大规模扩招,2002年达到了15%,2005年就达到了21%。这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青年的受教育机会。

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到了巨大的反差。老百姓对教育的评价、感受和教育取得的发展是相反的。教育在大众媒体当中,社会舆论当中,逐渐变成了一个比较负面的形象。在很多媒体调查中,教育被称为十大暴利行业。在2003年的一次调查中,在很多地方政府各行业的分析评比中,教育往往列为倒数第一。在2004年中纪委的一次调查中,教育被列为五大腐败重地之一。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教育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教育的声誉、品质、形象降到了近几年的最低点,公众不公平的感受非常强烈。刚才讲的三座大山,还有个说法是老百姓头上三条蛇,黑蛇,是司法腐败;白蛇,是医疗腐败;还有一条眼镜蛇。我们说,教育在千百年来是文明的源泉和道德的源泉。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比如文革时期,我们最多说它是清水衙门。现在不行了,腐败重地、暴利行业、三条蛇、三座大山。所以在党中央、国务院非常关心的民生问题中,教育首当其冲:上学难、上学贵。去年中宣部理论局出了个理论热点“面对面”,其中有一篇就是关于“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这是请我写的。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后,国家的经济能力极大的增长,老百姓的经济能力极大的增长,教育机会极大的丰富,在这个局面下,反而重新出现了“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十年、二十年以前倒还没有这个问题,什么原因?显然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这就是2003年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大的背景。实际上,教育这个情况并不是孤立的,在我们整个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当中都出现了这些情况,就是说在社会经济、社会财富极大的发展进步情况下,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等出现了扩大的趋势,也就是说社会的和谐和凝聚力的总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新的要求,提出了和谐社会新的目标,针对性非常强,就是针对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这些新的问题。下面,我分几个方面来谈谈关于教育公平、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教育公平的基本概念和对教育公平的一些理论认识。

首先来谈谈关于“上学难、上学贵”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奇怪的。在我们社会生活、教育机会极大改善后,重新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知道,现在重

新出现的“上学难、上学贵”，跟过去讲的“因为教育贫困而辍学”情况不太一样。“难”是难在上优质教育，“贵”也是贵在上优质教育资源、重点学校。这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九十年代以来，尤其是世纪之交，中小学教育阶段，出现了严重的择校竞争，高收费、乱收费。这种择校竞争从高中下放到初中，初中下放到小学，小学下放到幼儿园。现在有些幼儿园的收费，比大学还贵，天价幼儿园。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三岁就开始择校竞争，非常可怕。很多年轻的家长，孩子到三岁就开始发愁了，去哪个学校，怎么办，要多少钱。我北京有一个朋友，以前没有孩子，不了解情况。等他有了孩子，送去幼儿园的时候，他才发现没有低于两千元一个月的幼儿园，他大吃一惊。所以“上学难、上学贵”这个问题，重新出现了。

有一个流行的说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优质教育资源短缺，也就是学校总有好坏之分，所以老百姓总想把孩子放到好的学校里面，择校竞争就非常激烈。这说法有没有道理呢？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主要的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只要回想一下，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和五年以前、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毫无疑问，大规模地增加了。那为什么择校竞争反而越来越激烈了呢？我们回想一下，在八十年代，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只达到了2%、3%，现在是21%。那个时候升学竞争虽然很激烈，但是公众并没有特别强烈的不公平的感受，也就是说，即使一百个人里面只能考取一两个，我也不会觉得这是不公平。因为它的规则是公平的，机会是平等的，一视同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所以虽然我没有考上，但也心安理得，接受这个事实。所以这个公平的感受和教育机会的多少，不是简单的对应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机会更多了，反而不公平的感受增加了？这显然是有另外一些制度来支撑的。那么这些政策中，我认为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政策。第一，是关于重点学校制度。重点教育制度是在五十年代形成的，当时是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为上级学校输送拔尖人才制定的，当时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在我们实行义务教育制度以后，在义务教育中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把学校分成不同的等级，重点投资建设少数好的学校，这样的做法肯定是不合适的，是违反义务教育全民性、公共性的。所以在九十年代中期，国家教委就叫停了重点学校制度，已经宣布取消了。但我们知道，这制度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还是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这些年我们用实验学校、明星学校、示范学校，各种各样的概念，还是在延续过去建设重点学校的思绪，就是在资金、师资、招生政策，各个方面的优惠，我们现在学校的差距比过

去更大。只要我们采取这种倾斜政策,建设大量重点学校,那么学校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择校竞争就会越来越激烈。我们现在这个学校,很多各个城市的重点学校是什么情况?我说的是公办学校,基本概念:它的硬件水平超过了中国第一流的大学,超过清华、北大,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重点中学都是多媒体教室,全空调环境,没有一所大学能够达到这个水平。第二个概念,超过发达国家的公立中学。很多人去国外,比如日本,中国的校长都觉得我们的条件比他们要好得多。他们那里又没有什么体育馆、图书馆、艺术馆,也就是在顶楼加一个塑料的棚,下雨天可以做个体操。公立学校是用纳税人的钱办的,它不可能非常豪华、非常优越,这是不允许的。所以重点学校制度,人为地制造和加大了学校差距,这是择校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择校收费制度。我们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把用金钱换取学额合法化了,制度化了。在此之前,它是小规模,地下的,偷偷摸摸的,实际上是违规的行为。后来因为供不应求,高中择校生,北京拿出三万元。按现在的规定,义务教育还是不允许收择校生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个公开的秘密,在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收费远远不止三万元,八万、十万都有。我说的还是我们北京的,我知道宁波的义务教育精神文明是做得比较好的。像我们北京著名的史家胡同小学,是全中国最重点的重点小学,因为它是一个窗口。2006年4月,巴西的一个副总统到史家胡同小学参观,感动落泪。回国后,在国会上做报告,说到史家胡同小学又落泪了,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怎么怎么好。史家胡同小学教师的讲台,都是明清家具的。而实际上呢,巴西的基础教育平均水平要远远比中国好,它的人均GDP是3800美元,中小学全部是免费的,还有一顿免费的午餐,有校车接送,一般的条件比中国远远做得好。但他以为中国的基础教育都跟史家胡同小学一样,感动落泪。所以择校生制度是很厉害的。为什么大家会感到不公平,就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招生标准由原来单一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变成了多元化,三个标准:一个是考试进校,是公培生;第二个是交钱进校,是自费生;第三个是靠领导写个条子,叫条子生。在我们重点学校,条子生的比例相当大,所以重点学校的校长最头疼的还不是交费生。交费生毕竟交了钱,给学校做贡献了。条子生不好办,挡不住,没贡献,学习又不好。这个制度就把原来所谓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给打破了,造成了真正的不公平。

还有一个制度,就是转制学校制度。这个制度也很厉害。我们在上世纪九十年

代末以后，搞了一批中小学体制改革学校，所谓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后来发展成基本的模式，就叫做名校办民校，由名牌学校办的民办学校。那么举办这些学校，所有的动机就一条，就是高收费。因为你是原来的公办的重点高中，一年只能收几百元钱，第二天我宣布学校要转制了，变成民营机制了，收五千元。2006年中央台的《焦点访谈》连续曝光了两个地方，一个是重庆的万州市，一个是江苏的南通市，包括最著名的南通中学初中部，都是转制学校。学校所有的资源都是国有的，突然宣布是民营机制，高收费，原来五百，现在五千元。这就是赤裸裸的把国有资产变成赢利性的教育。所以极大地激化了这个择校竞争，扰乱了基础教育的秩序。所以转制学校这种东西，是很有害的。刚才讲的，表面上看是公立教育资源、优秀教育资源短缺，其实它是有另外原因造成的。

那么这些制度，在我们的舆论中，把它称为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并不是个理论概念，实际上是老百姓把教育中各种各样不规范的行为称为产业化。它是有一个大的背景，大的背景是指国家的教育资源投入严重不足，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国家教育资源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让各个学校自行其事，八仙过海，想办法赢利创收，是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政策，造成了这么多年来教育系统高收费、乱收费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成为了老百姓最不满意的问题。在2006年年底公布的消费者投诉中，教育仍然是高居榜首，比医疗、比房地产还要高。这种教育发展模式从学术的概念来讲，叫做单纯财政式的概念，也就是说教育改革的热点、重心都是围绕着经营、创收、脱贫，解决财政问题，也被称为教育改革的经济模式，并不是围绕着人才培养、教学质量。它有一个支撑的理论，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么这个理论本身是需要置疑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概念，是在1987年价格体制改革的时候提出的一个概念，它非常明确的是针对当时的价格体制改革，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体制而提出来的，它并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尤其是对于医疗、卫生、住房、社会保障这些公共事业。简单的引用这个逻辑是非常危险的，我想这就是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问题。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经济为本，不是以创收为本。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所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思路，来认识一下我们走过道路的问题所在，就比较清楚。那么在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发展教育，如何实现教育现代化？我们中国是一个个案，实际上在国外也有同样的教训，比较典型的是八十年代拉美国家的教育。拉美国家在四十年代的时候就走上了这条道路，充分意识到教育作为人类开发的巨大功能，



优先发展与经济直接相关的高等教育、科技教育、工程教育,也就是按照刚才说的经济模式,把教育视为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功能。它对基础教育的投资、中等教育的投资相对比较薄弱,所以造成教育断裂,就是培养了大量白领工作者的时候,也造就了大量的文盲,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阶层差距的加大。所以八十年代以后,拉美国家的现代化陷入了一个停顿状态,出现社会动荡、武装起义、金融危机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八十年代被称为是失去的十年。对这个拉美现代化模式的反思,到了九十年代初,像墨西哥颁布的教育现代化的纲领,明确提出支持以福利为目的的经济增长,就是要把经济增长确定它的价值导向,是以福利为目的,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要让高质量的教育和平等的教育机会向一切人开放,实现平等的增长,而教育重心要放在基础教育上,基础教育对这个过程起决定性作用,是教育模式中最优先的中心。所以墨西哥提出了“公正的现代化”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我想拉美国家的道路,他们的教训和总结,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现在发生的一些变化是有启示的。

在我们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以规模、速度为主要追求的发展模式中,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评价,就是我们说的片面追求 GDP 概念。在我们教育领域也有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是把教育的在校生的规模,高等学校的入学率、高考率,教育界把它称为教育 GDP。我们考核各级教育部门,评价的也是这些数量指标。这个评价是有很问题的,就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单纯追求 GDP 增长,这么一个评价,是造成刚才说的没有灵魂的增长,不公正的增长的一个主要问题。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有一本书,叫《以自由看待发展》,也就是说发展本身不是目的,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增进社会的福利,增进部门制度。在这本书里面,他深刻的剖析了单纯追求 GDP 的评价模式的局限性。他认为这种评价有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它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取向,也就是说它是用物质进步、经济增长来代替社会进步。而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现实的社会进步,经济增长只是它的一个指标,其他比如公民的权利、自由、正义、就业、环境等等等等,都是社会进步、社会质量的指标,GDP 评价只看中物质财富。第二个问题,它是一个后果主义的评价,也就是只重后果,不问过程,不惜代价,只要达到了一个数字、一个指标就是英雄,这样它会造成不科学发展。第三个问题,是这个指标有个平均假设,比如人均 GDP,假设这个 GDP 增长是人均分配的,就是它只重视增长的过程,从而忽视了分配过程。而事实上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社会,GDP 并不是真正按人均分配

的,但它造成了一个假象。所以 GDP 评价是重视增长,而忽视分配的评价,而老百姓对于社会进步的感受,对于社会公平的感受,主要是来自于第二个过程,就是增长的社会财富如何分配的过程。这就回到了我们刚开始讲的问题,为什么 95% 的基础教育普及率,21% 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老百姓还是不满意,对教育的评价还是那么低? 老百姓的感受并不是从数字里来的,而是从实际的教育过程当中和增长的财富是如何分配的这个过程得来的。举个例子。一个西北的农民,由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他供儿子上大学了,但是家里出现大学生、高材生,就意味着家庭经济破产,那他怎么会有幸福的感受呢? 尽管他获得了这个机会,但他是以全家的经济破产为代价的,所以他的满意度是不会高的。所以这种效率优先,单纯追求 GDP 的评价,它本身就是忽视社会公正,忽视分配过程。它还有一个假设,也是很不正确的,或者说是需要置疑的。它这个假设就是把追求社会公正推到了未来史,因为我们现在人均 GDP 才多少,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效率优先,先要把蛋糕做大,才能谈公平,现在我们的主要问题是不发展,而不是不公平。甚至有人认为,我们现在的公平产生太多,会影响经济发展。那么这个问题,阿玛蒂亚·森是怎么回答的呢? 他认为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只需要花很少的钱就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公共教育系统或者说公共医疗系统。而这种公共服务本身又会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我们让一个孩子从小接受教育,从小给他必要的医疗保障,减少疾病,他并不仅仅是一个消费过程,也是一个很高的经济回报率。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公平和效率并不是处在一个尖锐对立的状态,而是相互促进、共生共长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把公平和效率看成相互促进的过程,那么就不存在孰先孰后,否则的话公平永远是处在未来史中。这是我们讲的九十年代以来教育发展背后,它的发展观、评价体系引来的问题。

我们必须看到,从 2003 年以来,我们中国的整个社会发展观发生了巨大的调整和转型,教育领域的转变也相应发生了。我认为主要是从 2005 年开始的。2005——2006 年是比较实质性的转变。在 2005 年 5 月份的时候,教育部发了关于义务教育均衡化、规范中小学办学的通知,它跟以前的文件不同,因为整个社会发展观转变了。所以各地雷厉风行,采取紧急办法来规范严重失衡的义务教育秩序。北京就把实行了多年的“迎春杯”数学竞赛取消了。因为你存在这么一个竞赛,小学生就不得安宁,每个阶段要复习、考试,凭这个成绩来择校,虽然能够拿到优胜奖的是极个别、极少数,这是非常恶性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文件。更重要



的是 2005 年 12 月 30 日,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停止审批新的转制学校,清理转制学校。从 2006 年的实际来看,很多地方也采取急刹车的态度。比如天津,首先把转制的小学全部取消,全部恢复公办;转制的初中分三年,逐渐恢复公办。另外一个重要的举措是 2006 年 6 月,通过了新的《义务教育法》,明确地把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作为基本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如果现在你再用变相的方法来办重点学校,那就不仅是违规,而且是违法行为。不仅不能办重点学校,在学校里也不能办重点班、快慢班。我们知道,就这点,要真正做到,是非常困难的。我相信全国各地绝大多数的学校仍然在违法,很少有学校能做到不分重点班的,但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如果我们真正按照义务教育的宗旨,那必须是平等地面对每一个学生,不应该是先择校,再择班,再择教师,这些都是不平等的做法,都是应该改变的。第四个重要措施是 2006 年 5 月,国务院决定控制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2006 年高校招生规模控制在 5%,也是一个急刹车,很厉害。因为我们知道从 1999 年高校扩招以后,连续几年,高校扩招的规模为 40%多。前几年算比较稳定了,差不多 16%、17%。大家都意识到,如果高等教育再这么超常规发展,问题是很大的,严重的教育负债、高收费、贫困生、就业难,难以维系。所以高等教育被纳入了宏观调控的对象。但是大家没有想到,国务院这一刀砍得比较厉害。当时内部教育界讨论,大家都认为,比较理性的规模是 10%,跟 GDP 的增数相当。结果国务院这么一刀,就给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在“十一五”规划中,对教育提出了三项任务。第一个是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第二个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第三个比较有意思,是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这样子的提法,在我们的官方文件中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最近这两年是中国教育发生巨大的转型、转变之年。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比如教育公平究竟如何评价?从理论到实际,都有很多值得探讨和澄清的问题。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关于教育公平的基本概念。首先讲的是教育有促进社会平等的功能。过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对教育功能的认识是具有偏颇的。我们非常强调教育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功能,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教育促进科技发展的功能。我们通常把教育功能简化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科学技术的孵化器。但我们知道,在教育还没有为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服务的时候,它最基本的功能早就存在了。首先是人的协调发展,人的身心健康发展。第二个重要的功能是促进社会平等化的功能。也就是说通过教育改善处于社会不利地位人群的状况,

使他们能够参与向上的社会流动,减少社会分层造成的后果。所以教育平等化的功能,很早就被一些发达国家的教育家认识到了。他们认为,教育是实现人类平等的最伟大的工具。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也能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贫困地区,你给他送点面,送点钱,无济于事。如果他的孩子永远是文盲,他的贫困状态就永远无法改变。所以首先必须通过改变他的教育状况,改变他的社会地位。所以,通过教育来促进社会平等,增强社会凝聚力,形成一个共同的规范,共同的文化,这是教育最基本的功能,远远比它促进经济、促进科技更基本,更重要。这点是需要特别认识的。

另外一个呢,教育公平是一个社会公平的基础。刚才我讲的,如果你是一个文盲,就无法立足于现代社会。其他的社会机会、社会参与都谈不上。所以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和前提。这是它特殊的重要性。

第三个还要强调,教育公平是一个独立的发展目标。这话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现在经常把教育公平和效率连在一起,好像只有跟效率连在一起公平才有讨论的价值,而实际上恰恰相反。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一样,是人类有史以来一个最基本的人类理想,也是每一场社会革命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求社会平等,同样是社会主义理念最核心的核心要求。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就是更强调社会公正、公平,消除社会剥削、社会压迫。所以它是一个好的社会理想的追求,并不是说因为你效率的问题,才出现公平的问题,并不是这么回事。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要打破公平和效率尖锐对立的二分法。公平和效率不是一个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促进、共生共长的过程。在贫困的时候,可以谈贫困时期的公平,在经济高速发达的时候,可以谈发达阶段的公平。公平在不同的阶段,它的层面和问题的不一样,但都需要重视。

具体而言,教育公平的理论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教育权利平等,第二个是教育机会均等,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教育权利平等,是指国家在制度安排上,消除歧视,消除不公正待遇。那么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新中国建立,有没有教育歧视,有没有教育不公正?权利的歧视确实有,而且是大面积的存在。这就是我们在五、六十年代到文革以前,我们实行的一条以政治身份、家庭出身、政治态度来区别人的社会地位和教育机会的获得,当时叫做阶级路线政策。简单讲,你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很难获得更多的、更高的教育机会,这就是权利的歧视。这种歧视,在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就被彻底取消了。那我们现在还有没有权利性歧视呢?其

实也还有些,但是不像阶级路线政策那么大规模,那么显著的了。比如说关于残疾人的教育权利,关于流动人口的教育权利,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甚至有些学校还发生这种情况:有个学生因为长得难看而被拒绝录取。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中国,主要的问题已经不是权利的歧视,而是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仍然有很多人享受不到必要的教育。并不是我们歧视他,不允许他接受教育,而是因为我们现在教育资源的分配、教育质量,或者说我们的教育能力还无法满足他的教育需求,比如很多贫困地区学生的失学等等。所以教育机会均等问题更为普遍。所以我们今天谈的这个教育公平问题,主要关注的是教育机会的均等。那么再做一个区分,关于教育机会均等,又把它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一种是起点平等。起点平等从广义上讲,是指能够教育机会的平等、入学机会均等。与学业成就平等相比,是一种最低纲领的公平诉求,在实践中尤指保障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第二个是过程平等或参与平等,是指个人或群体在教育的不同部门和领域内经历和参与的性质和质量,例如个人参与教育的选择性,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开放性、可流通性,以保障个人能够接受自己所需要的教育。比如我们过去的教育制度,你考了中专,就不能再考大学了,这是人为的制度设计。第三个是结果平等。结果公平通常是指学业成就、教育质量的平等,是一种实质性的、目标层面的平等。现在看来,学业平等仍然是比较遥远的理想,也就是说影响学业平等的因素非常复杂。在中国,大家也基本上还没有从这个层面上来讨论问题。大家大量关注的是第一类的平等,就是起点公平,尤其是入学机会的平等。

以上是关于教育公平的基本概念,下面我要讲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到底什么叫公平?如何评价公平?

公平,没法用一个定量的方式来表达,是人的内心感受。那么究竟有没有办法来评价?很多哲学家、伦理学家探讨这个问题。现在世界范围内比较公认的是哈佛大学哲学大师罗尔斯。罗尔斯四十年代写了一本书,叫《正义论》。书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来探究这个问题。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被普遍接受,被认为是评价社会公平的基本原则。我们把罗尔斯的公正原则简化成三个。那么罗尔斯对正义的基本表述是这样的,他说:“所有的社会基本善,包括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和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也就是说,所有社会的基本善,都应该被平均分配。这个概念是很

经典,很有意思的。罗尔斯正义的三个原则:一是平等性原则,平等地对待所有人,尤其是社会权利平等、各种社会机会的开放。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很多问题。比如说国家公务员考试,必须是北京户口,很多人置疑:是国家公务员,又不是北京市的公务员,为什么要北京户口?这就是机会的开放不够。再比如招生,只招男的不招女的。这如果在国外,早就被告上法院了,绝对不允许,这在中国是司空见惯;二是差别性原则,由于客观存在的社会差距的人的个体差别,应当有所区别地对待不同的人;三是补偿性原则,是对第二个原则的补充,为处境不利者提供机会或利益补偿。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个评价,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多数人原则。也就是说一项政策,如果大多数人受益,那还是比较公平的。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分化、利益的分化,个人的利益诉求不一样,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但是首先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这是比较公平的。

那么我们有了这么几个概念以后,我们就可以去评价这个做法,哪个做法到底是不是公平的。比如说重点学校制度,它就是双重的不公平,第一,违反平等性的原则。本来义务教育是平等的,每个孩子都一样,不应区别对待。第二,违反了补偿性原则。如果要区别对待,应该向弱势群体倾斜,而我们的教育政策是向优势学校、优势地区、优势人群倾斜。中央台《新闻 30 分》报道了芜湖师范大学搞了个子弟班,就是芜湖市教委为了促进义务教育进程化,把三所重点初中全部取消。结果芜湖师大的子弟愿意就近入学,到周围普通的学校,办了个子弟班。采访我,问我这个政策到底怎么样?他们认为把重点学校一刀切,影响了他们享受好的教育的权利,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从报道上看到,因为芜湖每年初中入学的学生一共才一万多人,这三个学校有两千多人,使得择校非常厉害。然后芜湖市教委宣布这三所学校在 2006 年 9 月停止招生以后,这一万多学生马上就解放了,回到家就把书包给扔了,也不用补习,不用考试了,因为可以就近入学,没有什么好竞争的了,它的效益是非常明显。所以我说,如果用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用十年、八年的时间逐步提高教育质量,达到教育全员化当然也是个选择。但在当前情况下,为了迅速扭转炽热的择校竞争,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对三所学校停止招生,我个人也是赞同这样的做法的。因为这个政策显然是大多数人受益。

再比如,关于教育资源的配置。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教育资源比较多的投入到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而实际上呢,中国的教育发展始终面临着一个问题:是优先发展初级教育、农村教育,还是优先发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中等教

育和初等教育的比例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优先顺序,始终是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跟这个政策有关。实际上从公平的评价可以很明确,少年儿童的基础性教育,对于促进社会发展的意义远远超过高等教育,从公平角度毫无疑问。大量孩子成为文盲,这个社会怎么发展?无论对个人,对社会,代价都是非常大的。另外,即便从效益角度来讲,基础教育在发展中国家,基础教育的投资回报率也是最大的。这是由世界银行,很多研究来证明的。1984年,世界银行对中国教育的考察报告就写到了这点:在发展中国家,基础教育的回报率是最大的,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是最低的。所以讲到效率跟公平的关系,非常明确的看到,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平和效率是高度统一的,优先发展义务教育不仅是最公平的,而且也是有最高的投资回报率的。所以很多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这里还要讲到,义务教育为什么要均衡发展?为什么重点学校制度是不好的?这一点,大家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尤其是现在在整顿转制学校和取消重点学校。很多教育部门有一个说法,叫“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搞学分填补”,也就是说不能搞低水平的均衡,把重点学校的水平降低了。那到底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这里必须要做一个区分: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务。在义务教育阶段,概念是非常明确,必须是一视同仁,就是由义务教育的宗旨决定的,是面向每个儿童的基础教育,是一个保底的教育,是一个合格的教育。义务教育阶段不承担选拔优秀的功能,不承担培养尖子的功能,不具有竞争性、选拔性、淘汰性的功能。公办的义务教育都是平等主义,没有什么特别豪华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破旧的,就是大锅饭。有人说,家长有钱,想要接受好的教育,怎么办?对不起,那就自己花钱,民办学校。这也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几百年,一个普遍性的规律。教育部长周济说过:“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也就是说教育的丰富性、选择性、特色,主要是靠民办学校来保障,公办学校就是大锅饭。这个概念我们没有建立,我们多年来实行的重点学校制度,认为我们的基础教育具有选拔优秀、培养尖子的功能,把我们整个义务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的价值极大的模糊了,所以现在要拨乱反正,重新来认识义务教育的功能。它的第一位功能就是保障公平,保障每个孩子有学上。

下面跟大家讨论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公平问题的一些看法。主要是在推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均衡化进程中的各种看法,有些问题是需要探讨的。除了刚才讲的优质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另外的也有问题。有一种说法,公平是相对的,意思是不能太强调公平。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主张绝对的公平。对我们现